

南苏丹国家建构中的部落张力*

刘 辉

内容提要 本文深入剖析了部落在南苏丹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及其内在的紧张关系。部落作为南苏丹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对国家建构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南苏丹的部落社会特征表现为多元性、分散性、高度自治、军事化以及冲突的常态化。这些特征与现代国家建构之间存在结构性冲突：部落的独立性和自组织性限制了国家政治整合的能力，部落军事化削弱了国家对暴力的合法垄断，部落认同则成为国家认同的障碍。本文从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系统地分析了这些结构性因素，并阐释了部落问题对南苏丹国家建构产生的政治影响，包括社会力量强大而国家力量薄弱的治理格局，以及由于国民意识缺失导致的共同体建构失败。本文认为，协调部落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将部落整合进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南苏丹国家建构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南苏丹部落 国家建构 制度困境 族群政治

作者简介 刘辉，西安石油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西安710065）。

2011年7月，南苏丹共和国宣告独立，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但同时也位居最不发达国家行列。十多年后，南苏丹不仅未能摆脱贫困，反而成为全球最脆弱国家之一。根据美国和平基金会（The Fund for Peace）发布的2024年脆弱国家指数，南苏丹高居全球第三位，表明其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处于极高水平。^①2013年12月爆发的内战持续至2020年才平息，使得南苏丹的发展轨迹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南苏丹民族国家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XJC770004）的阶段性成果。

① “Fragile States Index 2024,” <https://fragilestatesindex.org/global-data/>, accessed November 12, 2024.

完全脱离了国际社会对其民主转型、和平建设以及制度现代化的预期。这种反差引发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为何新近独立的南苏丹陷入严重的暴力冲突？

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深入分析南苏丹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所遭遇的深层次制度困境。国家建构（State - Building）作为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的核心概念，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认为，国家建构包含两个核心内涵：一是通过制定并完善现代民族国家的各项制度，促进国家的政治整合；二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① 在既有文献中，关于南苏丹的研究，国外学界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南苏丹沦为失败国家的原因，国家建构所面临的挑战，以及部落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② 部落构成南苏丹社会的基本单元，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努维尔（Nuer）部落^③、丁卡（Dinka）部落及其冲突等方面。^④ 国内学者的研究多关注族群冲突、国家建构、

① [瑞士] 安德烈亚斯·威默：《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7 页。

② Jok Madut Jok, "Diversity, Unity, and Nation Building in South Sudan,"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Special Report 287, 2011; Pendulum Swings, "The Rise and Fall of Insurgent Militias in South Sudan," *Small Arms Survey*, No. 22, 2013; Wolfram Lacher, "South Sudan: International State - Building and Its Limits,"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2014; George Omondi and Nsamba A. Morris, *State - Building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Sudan*, Fahari Promoshop Ltd., 2011; Dorothy Nyong'o, *State Building in South Sudan: Priorities for Development Policy Research*, African Research and Resource Forum, 2013; Malok Pauline Adhong, "Ethnicity and Nation - Building: South Sudan," University of Nairobi, 2013; Paula Cristina Roque, "Reforming the SPLM a Requisite for Pea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14; Jacob Dut Chol Riak, *South Sudan State Formation Failures, Shocks and Hopes*, African World Books Pty Ltd., 2021.

③ Nuer 曾译为“努尔”，学术界现通常译为“努维尔”。

④ [英] E. E. 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褚建芳译，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Francis Mading Deng, *The Dinka: A Nilotic Lifecycle*, African World Books Pty Ltd., 2022; Francis Mading Deng,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A Challenge for Law among the Dinka of the Suda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Sharon E. Hutchinson, *Nuer Dilemmas Coping with Money, War, and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Robert O. Collins, *The Southern Suda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9; John Ajjugo, *Building of South Suda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nflict Resolution: The Case of Former Upper Nile*,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4; Kachuol Mabil Piok, *Managing Ethnic Conflicts in South Sudan: A Case Study of Jonglei State*,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5.

内战、国家治理、和平进程及现状等。^①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充分解析部落社会内在运作逻辑如何从根本上抵消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努力，特别是部落自治、军事化特征和认同建构对国家整合的多维度制约。

需要指出的是，部落问题并非南苏丹独立后才出现的新现象，而是根植于其历史社会结构中的内生性矛盾。部落社会的特性与现代国家建构逻辑之间存在潜在不兼容性，是理解南苏丹由新生国家迅速沦为“失败国家”的结构性变量。基于此，本文以部落为研究切入点，从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探讨南苏丹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所遭遇的制度性困境。本文首先考察南苏丹部落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部落特性与国家建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并进一步阐释部落问题对南苏丹国家建构进程产生的政治影响。本文旨在为深入理解南苏丹长期动荡的深层原因提供一种解释框架，并为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非洲国家提供比较研究的视角。

南苏丹部落社会的基本特性

南苏丹作为一个族群多元的国家，拥有64个部落，分属于不同的语系群体，形成了复杂的族群格局。^②部落社会表现出明显的自治性和独立性特征，大多数部落通过分支式无政府体系实现自给自足。长期存在的部落间冲突和资源争夺不仅导致社会军事化，更形成与现代国家暴力垄断原则相对立的权力分散格局，构成南苏丹国家建构过程中的结构性障碍。

（一）部落的多元性与分散性

南苏丹社会呈现出清晰的族群地理分布特征。丁卡部落作为最大的族群，约占总人口的15%；其次是努维尔部落，人口比例约为10%；接下来为说巴里语

-
- ① 李捷：《南苏丹现状研究：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视角》，《亚非纵横》2013年第4期，第8—14页；贺文萍：《南苏丹局势走向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14年第3期，第60—63页；曾爱平：《南苏丹冲突的内部根源》，《亚非纵横》2014年第4期，第53—62页；[南苏丹]勒本·内尔森·莫洛：《南苏丹的和平进程与国际社会的作用》，沈晓雷编译，《西亚非洲》2017年第2期，第44—62页；闫健：《政治—军队—族群的危险联结：南苏丹内战原因分析》，《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3期，第69—80页；王猛：《南苏丹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中东研究》2018年第2期，第13—34页；周光俊：《南苏丹分离运动的逻辑分析：1972—2011》，《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1期，第83—100页。
- ② Luka Biong Deng Kuol, “The Federalism – Decentralization – Peace Nexus in South Sudan,” in Luka Biong Deng Kuol and Sarah Logan (eds.), *The Struggle for South Sudan Challenges of Security and State Formation*, I. B. Tauris & Co. Ltd., 2019, p. 90.

(Bari) 的部落和赞德 (Zande) 部落; 希卢克 (Shilluk) 部落则在白尼罗河沿岸地区具有历史影响力。^① 南苏丹共和国共有 10 个州, 各部落都有相对固定的生活区域。丁卡部落主要分布于北加扎勒河州、瓦哈卜州、团结州、湖泊州、上尼罗河州和琼莱州; 努维尔部落集中于上尼罗河州、团结州和琼莱州北部; 希卢克部落生活在上尼罗河州, 沿白尼罗河两岸聚居; 说巴里语的部落主要在中赤道州; 赞德部落生活在西赤道州; 托普萨人 (Toposa) 生活在东赤道州; 西加扎勒河州主要居住着塔马人 (Tama) 和马萨利特人 (Masalit)。^②

南苏丹部落的社会政治结构呈现出二元分化特征: 既有平等型部落, 如丁卡和努维尔部落, 它们主要从事游牧经济活动, 以牛群作为核心经济资源和社会地位表征; 也有初步具备国家形态的非平等型部落, 如赞德部落和希卢克部落, 它们发展出较为完整的政治组织体系和等级结构。19 世纪赞德部落建立的国家政权^③以及希卢克部落由神圣领袖 (雷特, Reth) 统辖的体系,^④ 代表了部落向早期国家形态过渡的不同路径, 这种内部差异增加了南苏丹进行部落整合的难度。

(二) 部落社会的独立性与自组织性

南苏丹每个部落均建立了独特的社会运行机制, 并表现出较强的自治性。丁卡和努维尔这两大部落体现了分支式无政府社会 (Segmentary Acephalous Society) 的典型特征。在这种社会形态中, 每个支系都能自给自足、丰衣足食、自成防卫。各支系可以为共同目标 (如自卫) 临时结盟, 但日常生活并不依赖彼此。在同一社会层级上, 每个个体只能属于单一支系。^⑤ 部落成员之间地位平等, 即使是部落酋长, 也主要发挥调停与说服功能, 而不能强制命令。

在不同部落中, 权力结构呈现出多样性。丁卡和努维尔部落的酋长与西方政治体系中的统治者有本质区别, 他们既非政治代理人, 也非司法权威, 而是扮演特定的社会角色。努维尔部落的酋长扮演着调停者的角色, 丁卡部落的酋长则被

① Addis Ababa Othow Akongdit, *Impact of Political Stability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se of South Sudan*, Authorhouse, 2013, p. 100.

② John Ryle, Justin Willis, Suliman Baldo and Jok Madut Jok, *The Sudan Handbook*, James Currey, p. 32.

③ James Copnall, *A Poisonous Thorn in Our Hearts Sudan and South Sudan's Bitter and Incomplete Divorce*, Hurst & Company, 2014, p. 35.

④ John Ryle, "Peoples & Cultures of Two Sudans," in John Ryle, Justin Willis, Suliman Baldo and Jok Madut Jok (eds.), *The Sudan Handbook*, p. 40.

⑤ [美] 弗朗西斯·福山: 《政治秩序的起源: 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毛俊杰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56 页。

视为精神领袖，其言论被认为是传递神圣启示与智慧的媒介，旨在促进共识与和解。^① 尽管这些部落在形式上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府和法律体系，但它们通过分支世系体系，构建了一种“有序而无政府”社会结构。相比之下，赞德部落和希卢克部落则发展出更接近现代国家的中央集权式社会结构。尽管英国殖民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两大部落的传统权威结构，但其基本权威体系仍然存续，并在当代部落事务中继续发挥作用。

无论是分支式无政府部落还是中央集权式部落，南苏丹的部落社会均表现出自主且相对完整的治理结构，形成了不依赖现代国家机构的社会秩序生产机制。这种独立性和自组织性——通过共同祖先血缘纽带维系，依托习惯法和长老会议解决内部纠纷，在面临外部威胁时形成临时同盟——构成了与现代国家权威直接竞争的平行治理体系。这种治理现实使南苏丹政府面临的挑战不仅限于权力扩张维度，更涉及国家基础合法性的构建。

（三）部落社会的军事化特征

南苏丹部落社会表现出的系统性军事化特征，不仅是长期冲突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反映了部落间资源竞争和权力斗争的复杂性。

首先，政治精英通过动员部落力量来进行政治对抗。1983年，时任苏丹总统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Gaafar Muhammad Nimeiry）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伊斯兰法，触发南北第二次内战。随后，约翰·加朗（John Garang）组建苏丹人民解放军（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与苏丹中央政府展开长达22年的内战。此后，苏丹人民解放军的分裂是南方部落军事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1991年8月，由于对战争目标存在分歧，苏丹人民解放军分裂为两个派系：由丁卡人加朗领导的托里特派（SPLA - Torit）与由努维尔人里克·马查尔（Riek Machar）主导的纳西尔派（SPLA - Nasir）。为扩充军事力量，两派分别招募本族平民，这些武装起来的平民构成南苏丹复杂军事生态的一部分，许多年轻人拿起武器参与冲突。^② 其中，努维尔白军（Nuer White Army）是典型代表，在南苏丹独立后继续活跃。

其次，苏丹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南方部落的军事化进程。苏丹武装部队利用某些部落对苏丹人民解放军内部纷争的不满，把他们武装起来以对抗苏丹人民解放军，特别是在东赤道州，这一现象尤为显著。这些被武装的平民群体

① Francis Mading Deng, *The Dinka: A Nilotic Lifecycle*, p. 183.

② Nyambura Wambugu, *Post - Conflict Security in South Sudan From Liberal Peacebuilding to Demilitarization*, I. B. Tauris, 2019, p. 55.

成为苏丹南北战争遗留的安全难题。^① 2002—2003 年，随着与北方全国大会党和平谈判的临近，南方社会的军事化程度显著提高，各方势力扩充武装力量，以期在谈判中争取更多利益。尽管 2005 年 1 月《全面和平协议》签署后，南方地区政府试图收缴部落民众手中的武器，但是成效甚微。

再次，苏丹人民解放军和南苏丹防御部队（South Sudan Defence Forces）^② 的退伍军人加强了部落军事化趋势。2005 年《全面和平协议》签署后，大量苏丹人民解放军士兵返乡，这些退伍军人虽然不再参与正规军事行动，但仍保留军事认同和个人武器。^③ 2006 年《朱巴宣言》宣布南苏丹防御部队与苏丹人民解放军合并后，部分抵制合并的南苏丹防御部队指挥官，包括戈登·丘尔（Gordon Kong Chuol）、加布里埃尔·坦吉涅（Gabriel Tanginye）和托姆·奴尔（Tome el Nour）回到部落，重新武装当地居民，以扩大自身势力。^④ 他们的武装力量主要以部落民兵为基础，与国家军事体系形成并行架构。

最后，长期武装冲突导致武器在社会中广泛扩散。南苏丹独立两年后的一项调查发现，东赤道州的大多数家庭拥有枪支，武器持有和使用已融入日常生活。^⑤ 据相关统计，南苏丹约 900 万总人口，民间流通的武器数量达到约 270 万件，这意味着平均每 3 人中就有一人持有枪支。^⑥ 武器泛滥与部落民兵制度化共存，加上国家权威羸弱、社会动荡以及资源争夺等因素，使南苏丹社会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在这种环境下，部落代表凭借本族支持，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挑战国家权威。

（四）部落冲突的常态化

南苏丹的部落生态中，相邻部落之间因争夺牲畜、牧场、水源等资源而频繁发生冲突。血亲复仇传统加剧了部落间的紧张关系，资源稀缺、族群边界模糊以及历史积怨等因素共同导致部落冲突的常态化。同属尼罗特语系的丁卡部落和努维尔部落之间的冲突最为引人注目。尽管这两个部落有相似的语言和生活方式，

① Nyambura Wambugu, *Post - Conflict Security in South Sudan From Liberal Peacebuilding to Demilitarization*, p. 56.

② 南苏丹防御部队是南苏丹历史上一支与苏丹政府短暂结盟的民兵联盟，活跃于第二次苏丹内战（1983—2005 年）后期至南苏丹独立前。

③ Nyambura Wambugu, *Post - Conflict Security in South Sudan From Liberal Peacebuilding to Demilitarization*, p. 95.

④ George Omondi and Nsamba A. Morris, *State - Building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Sudan*, p. 52.

⑤ Nyambura Wambugu, *Post - Conflict Security in South Sudan From Liberal Peacebuilding to Demilitarization*, p. 81.

⑥ 陈慧娟：《南苏丹琼莱州族群冲突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年，第 40 页。

但它们之间的敌对状态已延续数个世纪，这种对立甚至延伸至部落内部的支系层面。^① 在丁卡部落与努维尔部落的冲突历史中，努维尔人通常采取主动进攻姿态，将对丁卡人的攻击视为一种族群责任。^② 长期的部落冲突严重破坏了部落间的正常交流渠道，导致群体间暴力记忆代际传递，使任何轻微的摩擦都可能引发新一轮的部落冲突。

在苏丹南北分离之前，中央政府对南方地区的控制力较为有限。从法理层面而言，南方地区虽属喀土穆政府法定管辖范围，但这种主权宣示仅具形式意义，其实际行政控制仅覆盖主要城市及周边 5 英里的区域。^③ 因此，在 1956—2005 年的半个世纪里，苏丹中央政府对南部地区各部落的实际影响力始终处于极低水平。由于南北战争的持续，南方各部落间的矛盾冲突被一定程度地掩盖，未受到足够关注。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南苏丹的部落冲突问题开始显现。

部落军事化加剧了部落间冲突。托普萨部落的一位代表指出：“自从会使用枪后，便开始照顾牛群。这个责任很大，因为其他部落会来偷我们的牛。作为回应，我们也会袭击他们，偷走他们的牛。”^④ 随着部落军事化程度的提高，各部落的防卫武器从传统弓箭发展为现代 AK—47 自动步枪。^⑤ 赞德部落的民兵组织“弓箭男孩”即以最初使用的防卫武器命名。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部落和解机制逐渐被废弃，冲突愈发难以控制，安全局势日益恶化。

2011 年 1 月，南苏丹举行全民公投，决定脱离苏丹成为独立国家。同年 7 月 9 日，南苏丹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作为全球最年轻的主权国家，南苏丹也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据南苏丹政府的调查数据，该国约有 50.5%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每月消费不足 73 苏丹镑（约合 36 美元，或每天约 1 美元）。从实质上看，南苏丹的政治独立仅是众多部落披上民族国家的外衣，要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南苏丹必须进行国家建构，建立民众与国家间的政治联系，培育国家认同，改善民众生活条件，实现民众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

① James Copnall, *A Poisonous Thorn in Our Hearts Sudan and South Sudan's Bitter and Incomplete Divorce*, p. 33.

② [英] E. E. 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第 185 页。

③ Nyambura Wambugu, *Post - Conflict Security in South Sudan From Liberal Peacebuilding to Demilitarization*, p. 21.

④ Ibid., p. 116.

⑤ Ibid., p. 50.

部落与国家建构的结构性困境

南苏丹部落社会的特性与现代国家建构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并非简单的政治权力冲突，而是一种国家权力难以有效渗透到社会层面的制度性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部落自治性制约了国家的政治整合，部落军事化挑战了国家对暴力的垄断，部落认同阻碍了国家认同的形成。

（一）部落自治对国家政治整合的制约

国家建构理论强调政权对治下体系结构的贯彻与渗透。^① 民族国家的形成要求新政府对领土范围内所有人口进行有效统治和管理。领土范围内的人口被界定为国民（公民），不分族裔、性别、年龄，直接受政府管辖与监督。国家不容许任何与统一的法律制度和中央政府竞争或分庭抗礼的组织存在。^② 南苏丹独立后建立了一套行政体系，州以下的地方政府分为县、乡（Pamas）、村（Boma 或 Ward）三级。^③ 中央政府试图通过现代行政体系实现对民众的管理，但是政令几乎只能到达县一级，对乡和村的影响很有限。受传统部落社会运行机制的影响，新政府无法对领土范围内的部落民众进行有效管理。南苏丹人高度重视其部落归属，^④ 部落民众对新国家缺乏认识，难以接受议会、政府、司法机构及银行货币等现代制度。^⑤

如前所述，丁卡部落和努维尔部落是典型的平等分支式无政府社会结构。这种部落社会不依赖文字记录、宪法文本甚至正规教育体系，而是通过自组织机制维持运作，具有强大的独立性。例如，丁卡人普遍认为政府的职责主要限于收税、设置警岗和任命行政长官；在他们的观念中，政府只是一种外部力量，其行为模糊难测。^⑥ 在南苏丹，大多数部落社会遵循分支裂变的世系原则。以努维尔部

① 陈明明：《从族裔到国族》，《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1—2页。

② 陈明明：《从族裔到国族》，第3页。

③ Lovise Alen, "African Decentralisation as a Calculation and its Relevance for South Sudan," in Luka Biong Deng Kuol and Sarah Logan (eds.), *The Struggle for South Sudan Challenges of Security and State Formation*, p. 203.

④ Amy Rechner, *South Sudan*, Bellwether Media, Inc., 2019, p. 16.

⑤ Nyambura Wambugu, *Post - Conflict Security in South Sudan From Liberal Peacebuilding to Demilitarization*, p. 121.

⑥ [美] 约翰·莱尔：《白尼罗河的勇士：丁卡人》，李欣、张小玲译，华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落为例，部落成员基于共同祖先，通过分支裂变世系构建了自组织的社会结构。即使是中央集权式的赞德部落和希卢克部落，也都拥有各自独特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两个部落只承认本部落首领的权威，对于国家权力持有排斥态度。希卢克王国构建了以雷特为核心的中央王权体系以及由地方酋长构成的地方治理体系。^①因此，南苏丹部落的传统自治模式与现代国家所要求的集中统一管理体制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制度冲突，难以实现有效的政治整合。

在苏丹南北分离前，南方是全国最不发达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无法深入影响部落社会。南苏丹共和国成立后，传统部落社会的运行机制依然存续。2011年，南苏丹独立后组建新政府，并颁布新宪法和相关法律。然而，部落民众对现行国家制度缺乏认知，特别是在偏远部落社会中，民众只对传统部落有认同感。2012年2月至2013年8月，学者纳伊姆布里·瓦姆布古（Naimburi Wambugu）在东赤道州进行调查发现，尽管民众参与了2010年的选举和2011年的独立公投，但是高达80%的受访者对政府和选举的概念仍一无所知。^②因此，中央政府无法对部落民众进行有效治理。尽管南苏丹已成为独立国家，但部落民众尚未成功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民众对部落的忠诚深植人心，国家和国民之间应有的契约性政治关系在南苏丹尚未完全建立，国家也远未实现对部落民众的政治整合。

（二）部落武装对国家暴力垄断的挑战

马克斯·韦伯指出，国家是一定区域的人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本区域内要求有效地垄断合法的有形暴力。国家被视为唯一的合法暴力来源，并具有强制性。^③但在南苏丹，国家对暴力的合法垄断遭到部落民兵的系统性抵制。如前所述，常年的战争以及裁军、复员和重建工程的不力，导致南苏丹各部落掌握大量武器。此外，南苏丹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独立红利及和平红利加剧了部落间的竞争。具有强大独立性和自组织性的部落为了争夺更多利益，纷纷组建民兵组织，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前文提及的戈登·丘尔即为一例，作为南苏丹防御部队的领导者之一，他带领部分努维尔部落民兵在上尼罗河州东部发起叛乱。^④南苏

① 王国森：《南苏丹希鲁克王国传统治理体系的变迁及其影响》，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32页。

② Nyambura Wambugu, *Post - Conflict Security in South Sudan From Liberal Peacebuilding to Demilitarization*, p. 121.

③ [德]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31页。

④ Pendulum Swings, "The Rise and Fall of Insurgent Militias in South Sudan," p. 7.

丹独立后不久，10 个州中就有 7 个州爆发了武装叛乱。^①

在南苏丹，努维尔部落、穆尔勒部落、丁卡部落、希卢克部落、托普萨部落的民兵势力较为强大，其中最为知名的是努维尔白军。该组织最初由努维尔部落年轻人构成，肩负着保护社区和对袭击者实施报复的任务。^② 在战争环境中，努维尔白军的军事力量不断壮大，足以挑战国家权威。^③ 2013 年 12 月南苏丹内战爆发后，努维尔白军成为马查尔的坚定支持者，成功抵御了政府军的反击，并导致苏丹人民解放军师长经古鲁尔（Jongroor）准将阵亡。^④ 在马查尔的干预下，努维尔白军才停止向首都朱巴进军。^⑤

另一支影响力较大的部落民兵组织是穆尔勒部落首领大卫·尤·尤（David Yau Yau）领导的眼镜蛇派（Cobra Faction）。大卫宣称，叛乱的主要原因在于皮博尔（Pibor）县的发展滞后、被边缘化，以及当地政府未能与穆尔勒人分享权力。^⑥ 此外，希卢克人约翰逊·奥洛尼（Johnson Olony）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西赤道州的“弓箭男孩”由赞德部落的年轻人组成，成立之初旨在保护社区和财产安全。丁卡人的部落民兵组织包括马提昂·安约尔（Mathiang Anyoor）和地方自卫团体（Gelweng），前者直接效忠基尔政府，而后者是丁卡青年组成的牛群护卫队。

南苏丹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几乎无力整合或解散这些部落民兵组织。部落民兵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国家安全机构的职能，并且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部落民众本就对国家、政府、军队、法律等概念缺乏认知，独立后的国家未给民众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和更优质的生活，甚至安全保障也仰赖部落民兵，诸如努维尔白军等部落民兵组织，直接为部落提供安全保障。为了实现国家稳定，政府采取将部落民兵首领纳入政府机构等措施。2014 年 1 月，基尔总统与穆尔勒部落首领大卫签署停火协议，并成立大皮博尔行政区，任命大卫担任首席行政长官。南苏丹独立之初仅设有 10 个州，但仅 7 年后增至 32 个州，这一变化与部落民兵问题密切相关。然而，单纯增加行政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部落民兵叛乱问题，经过一系列博弈，2020 年南苏丹的行政区划再次进行调整，全国重新设立 10 个行政州，另设 3 个行政区。

① Jok Madut Jok, "Diversity, Unity, and Nation Building in South Sudan," p. 11.
 ② Hoth Giw Chan, *South Sudan Conflict of Ethnic & National Identity*, Light Switch Press, 2019, p. 329.
 ③ Hoth Giw Chan, *South Sudan Conflict of Ethnic & National Identity*, p. 331.
 ④ Ibid., p. 336.
 ⑤ Saferworld, *Informal Armies Community Defence Groups in South Sudan's Civil War*, p. 4.
 ⑥ Pendulum Swings, "The Rise and Fall of Insurgent Militias in South Sudan," p. 3.

规模庞大的部落民兵组织不仅阻碍了国家对暴力的合法垄断，更从根本上动摇了国家权威的正当性基础。这种非国家武装力量的存在导致中央政府无法履行基本治理职能，形成持续性的安全治理赤字。以大卫政治收编事件为例，尽管其本人获得国防部副部长职位实现体制内整合，^① 但是其旧部仍持续参与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 IO）^② 的叛乱活动。这表明政治收买无法彻底解决部落民兵问题，只要部落仍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部落民兵就会持续存在，国家就可能处于极大的不稳定之中。

（三）部落认同对国家认同建构的阻碍

首先，传统的部落冲突强化了部落认同。南苏丹共和国成立带来的大量和平红利和独立红利使部落间竞争加剧，冲突与争斗也更为激烈，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极度贫困、对石油收入的高度依赖，以及小部落在有限的政治经济机会中被边缘化，都是南苏丹部落冲突重要原因。^③ 南苏丹独立后不到半年，努维尔部落与穆尔勒部落之间爆发冲突；紧接着，穆尔勒部落与丁卡部落也发生冲突。2011年12月至次年2月期间，努维尔人的武装力量袭击了皮博尔县穆尔勒部落的21个居住点，造成612名穆尔勒人死亡，42名儿童和妇女被劫持，数千人流离失所。^④ 这些频繁的部落冲突不仅恶化了部落间关系，强化了部落认同感，而且阻碍了统一国家认同的形成。

其次，政治精英间的权力斗争加强了部落认同。在穆尔勒部落与努维尔部落的冲突平息后，2013年的内战再次触发努维尔部落和丁卡部落之间的矛盾，导致南苏丹自独立以来最严重的部落冲突事件。2013年12月，首都朱巴发生超过两万名努维尔人被杀事件，本提乌、博尔、马拉卡勒等地区也发生类似事件。系列冲突事件强化了努维尔部落的内部凝聚力，形成对马查尔领导集团的强大支持。努维尔白军被动员起来，加入对丁卡人的报复行列，^⑤ 新独立的南苏丹因此

① Alex de waal and Naomi Pendle,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Logic of the Political Marketplace in South Sudan," in Luka Biong Deng Kuol and Sarah Logan (eds.), *The Struggle for South Sudan Challenges of Security and State Formation*, p. 185.

② Alex de waal and Naomi Pendle,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Logic of the Political Marketplace in South Sudan," p. 185.

③ Lukong Stella Shulika and Nwabufo Okeke Uzodike, "Inter-ethnic Conflict in South Sudan: a Challenge to Peace," *Conflicts Trends*, January 2013, p. 26.

④ Kachul Mabil Piok, *Managing Ethnic Conflicts in South Sudan: A Case Study of Jonglei State*, p. 3.

⑤ Hilde F. Johnson, *South Sudan: The Untold Story From Independence to Civil War*, p. 199.

陷入部落战争的泥潭。更为严重的是，部落间冲突严重阻碍了国家对部落社会的整合，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无法建立良好的互动与合作关系。

最后，生活状况恶化导致民众寻求部落保护成为常态。2013 年 12 月南苏丹内战爆发后，随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上升，民众感觉经济压力巨大，甚至无法购买基本生活必需品。^① 南苏丹人普遍感到被抛弃，对领导人和政府失去信任，政府甚至无法履行保护民众这一基本职责。^② 2019 年 7 月，估计有 696 万南苏丹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③ 弱化部落意识形成国家认同要求部落民众能够充分感受到即便失去部落庇护，他们也能享有国家提供的权益和更好生活。^④ 然而，生活状况恶化却促使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部落中寻求庇护。

以上三重困境相互关联、相互强化：部落自治侵蚀了国家的制度渗透能力，导致政治整合失败，这种权力真空促使部落通过军事化寻求自我保护；部落军事化不仅挑战了国家暴力垄断，更通过共同防御经历强化了部落内部凝聚力和认同感；部落认同又反过来巩固了部落自治意识，抵制国家权力的介入。这种相互关联的机制，使南苏丹陷入“弱国家—强社会”的结构性困境，这为理解其社会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关键分析框架。

部落问题对国家建构的政治影响

如前所述，南苏丹部落社会的特性与国家建构之间存在内在矛盾。在进行国家建构时，南苏丹必须着力构建民众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将各部落纳入包容性的权力结构中，以此构建统一的国家共同体，实现国家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然而，南苏丹在国家建构的实践过程中，反而强化了部落色彩，这与客观要求背道而驰，因此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

-
- ① Nora Dihel and Utz Pape, “The Challenges of Macroeconomic Stabiliz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South Sudan”, in Luka Biong Deng Kuol and Sarah Logan (eds.), *the Struggle for South Sudan Challenges of Security and State Formation*, p. 213.
- ② Julia Aker Duany and Wal Duany, *The 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Army (SPLM/A) A Systematic Crisis for South Sudan 1983 – 2013*, Authorhouse, 2017, p. 116.
- ③ 《南苏丹严重缺乏食物人数创新高》，《世界农业》2019 年第 7 期，第 116 页。
- ④ 王铁铮：《关于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西亚非洲》2021 年第 1 期，第 13—14 页。

（一）形成强社会弱国家的治理格局

尽管民族国家被视为“真正大型的政治制度组织”^①，但在南苏丹的现实情景中，国家并非社会中最强势的组织，部落及其衍生的社会力量对国家构成难以逾越的障碍。这种强社会弱国家的格局严重制约了国家治理能力，使得政府难以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稳定。部落的存在以及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关键作用形塑了南苏丹的政治权力配置机制，该机制不仅缺乏包容性，还表现出排他性特征。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是南苏丹独立运动的核心组织，主要由丁卡人和努维尔人组成。2011年南苏丹独立后，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构及政府主要部门均由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主导。^②在首届内阁中，石油部、国防部、外交部和财政及经济计划部等核心部门的关键职务均由丁卡部落和努维尔部落成员担任。^③尽管其他部落中有许多优秀人才，却未获任职机会。

在南苏丹的公务员体系中，丁卡部落与努维尔部落占据主导地位，而其他部落成员则鲜有机会担任公职。那些未被纳入政治联盟的部落，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2013年12月南苏丹内战爆发后，中赤道州前州长克莱门特·瓦尼·孔加（Clement Wani Konga）将冲突界定为丁卡族和努维尔族之间的对抗，并告诫原赤道省^④人避免卷入其中。他指出：“这是赤道省人联合起来结束丁卡人和努尔人战争的唯一机会。你们将为谁而战？你们将同丁卡人一起作战吗？还是和里克·马查尔一起？”^⑤原赤道省人对丁卡人持有深刻的敌意和不信任，早在独立前双方就因丁卡人侵占土地、放任牲畜进入他们的农场等问题积怨颇深。2011年南苏丹共和国成立后，赤道省人长期居住的朱巴被定为首都，这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2013年12月内战爆发后，时任西赤道州州长约瑟夫·班加西·巴卡索罗（Joseph Bangasi Bakasoro）甚至组建了武装部队，进行反政府活动。^⑥

-
- ① [英国]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 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第二卷），陈海宏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60页。
- ② Addis Ababa Othow Akongdit, *Impact of Political Stability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se of South Sudan*, p. 83.
- ③ Hoth Giw Chan, *South Sudan Conflict of Ethnic & National Identity*, p. 7.
- ④ 原赤道省即现在的东赤道州、中赤道州和西赤道州。
- ⑤ Jacob Dut Chol Riak, *South Sudan State Formation Failures, Shocks and Hopes*, p. 86.
- ⑥ Hoth Giw Chan, *South Sudan Conflict of Ethnic & National Identity*, p. 20.

族群间的政治平等是国家建构的关键要素。^①然而，在南苏丹国家建构过程中，部落间平等却未能实现，部落身份几乎成为职务任命与晋升的唯一标准。如前所述，南苏丹形成了以丁卡人、努维尔人为主导，其他部落为辅的二元权力格局，政府未能在全民中搭建起连接部落的政治桥梁，也未能将各部落整合进具有包容性的权力架构中，这对国家建构进程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当前阶段，部落在南苏丹政治生活中持续发挥关键性作用，它不仅是社会组织架构的具象化呈现，更是认同、心理归属和文化遗产的载体。因此，南苏丹国家建构必须改革排他性的政治制度，实现部落间的权力均衡，构建稳定的部落关系，以期实现持久和平。

（二）国民意识缺失与共同体建构的挑战

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南苏丹是先有国家，后有民族。从国家形态来说，南苏丹已经具备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但从国民文化的同质性来看，南苏丹还处在民族国家构建的初级阶段，民族认同处于萌芽状态。在现代国家缔造民族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目标是确立民族特性，培育国民之间的相互认同，以及对国家的政治认同。^②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亟须推进国家认同的制度化建设，通过系统性整合国内多元部落，建构具有共同国族意识的政治共同体，从而使其成为全体公民的“政治归属”。

为摆脱北方阿拉伯人的统治，历史上不同部落曾在抵御共同敌人的旗帜下汇聚。然而，在实现国家独立后，部落社会的特性与领导人的刻意引导使民众的部落身份更加强化，部落身份甚至成为争取和平红利和独立红利的工具。因此，从普通民众到部落酋长乃至国家领导人，其首要身份往往是部落身份，而非国民身份。部落身份成为获取资源、权力和职位的首要标准，部落酋长们对此已有深刻认识。2012年9月，穆尔勒部落所有酋长在皮博尔县举行会议，最杰出的“红酋长”发表讲话：“多年来我们一直遭受喀土穆政府的不公正对待，独立使我们摆脱了他们。但是，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差异正被利用。人们已成为部落主义者。我们赢得了独立，却彼此敌视，这种情况必须停止。”^③

在经济发展滞后、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且社会动荡的背景下，民众仍依靠部落实现其政治诉求，总统同样受限于部落身份，利用部落身份打击对手，而非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解决部落间的矛盾。2013年内战爆发后，基尔总统下令对朱巴

① [瑞士] 安德烈亚斯·威默：《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第7页。

② 王建娥：《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内涵、特征及联系——以欧洲国家经验为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25页。

③ Hilde F. Johnson, *South Sudan: The Untold Story From Independence to Civil War*, p. 121.

地区的努维尔人采取军事行动，导致朱巴地区超过两万名努维尔人遭到杀害。努维尔部落的指挥官因此倒戈，加入反政府武装，例如苏丹人民解放军第8师指挥官彼特·加德特（Peter Gadet）和第4师少将詹姆士·科昂·丘尔（James Koang Choul），^① 国家陷入更深的混乱之中。为了在战争中生存，南苏丹人民持续强化部落认同，导致国家认同建构进程遭受结构性削弱。

精英阶层刻意利用部落身份获取支持和资源，无助于解决冲突，反而加剧了社会分裂，使得构建超越部落的共同体意识变得更加困难。认同感既是个人对群体的心理归属，也是情感依附。不同的认同感衍生出不同的利益诉求，进而引发不同的政治行为。在南苏丹国家建构过程中，部落认同感的固化不仅强化了国家分裂的倾向，阻碍了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也使得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国民文化难以孕育。在这样的国家中，民众的首要身份是部落成员，因为这关系到生命、生存、财富与职位。最终，作为全体公民应有的南苏丹人身份无法建构，南苏丹作为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也无法得到全体国民的认同，导致这个新兴共和国始终处于动乱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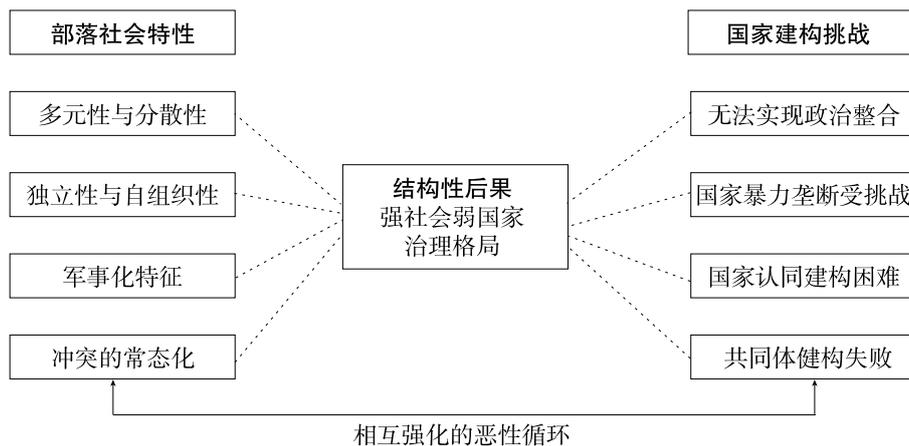


图1 南苏丹部落与国家建构的结构性张力

注：部落社会特性与国家建构要素之间的张力构成南苏丹国家建构的基本困境。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结 论

部落问题是理解南苏丹社会政治危机的核心解释变量，揭示了这一新生国家独立后迅速沦为“失败国家”的结构性根源。部落作为南苏丹共和国的基本单元，与国家建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至今仍无法破解，国家对社会力量整合的能力严重

^① Hoth Giw Chan, *South Sudan Conflict of Ethnic & National Identity*, p. 38.

不足，特别是对部落这一基础社会单元整合失效，是导致南苏丹长期不稳定的核心动因。南苏丹从前国家形态的部落社会结构直接跨越至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其国家建构过程呈现出显著的断裂式的非连续特征。这种历史发展的跳跃性使南苏丹缺乏渐进的制度演化路径，导致基于血缘的部落内部机械团结压制了基于功能分化的有机团结。南苏丹共和国在通过现代国家制度和法律对部落进行有效管理方面遭遇重大挑战：国家的强制性、集权性同部落社会的自治性、独立性之间形成了剧烈冲突。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实际上是由众多分散的部落构成的地域政治实体，缺乏统一的民族认同感。直到现在，部落问题依然是南苏丹国家建构的最大障碍。

因此，南苏丹面临的首要任务在于提升国家基础治理能力，实现对部落的有效整合，并建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其终极目标是将部落纳入现代国家治理框架，使民众突破部落身份的束缚，成为真正的国民。对于这个全球欠发达国家而言，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可预见的未来，南苏丹仍将处于不稳定状态。部落问题并非南苏丹特有的，而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建构进程中共同的结构挑战。在许多后殖民非洲国家中，传统部落制度与现代国家体系之间的不兼容性已成为制约政治稳定与国家整合的关键变量。利比亚、索马里及苏丹等国持续动荡，几乎都与部落和国家之间的博弈密切相关。因此，协调部落与国家的关系，将部落纳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解决非洲国家政治社会动荡问题的关键所在。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适应性治理框架的构建，即如何在尊重部落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和权力分享机制实现部落传统权威与现代国家权力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责任编辑：贺杨）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Jilin University, Assistant to Global Energy and Climate Governanc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latform Project (Changchun 130012).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under the Indo – Pacific Strategy:
Geopolitical Value and Major Power Rivalries**

Jiang Lu and Shu Zh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have intensified efforts to construct the so – called “Indo – Pacific Strategy” in response to China’s rising national power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in – depth analysis of how major Indo – Pacific powers—represe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India—perceive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their comprehensive deployments in the region,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China.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region from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to Africa is crucial for securing China’s energy and critical mineral supply routes. Meanwhile, this region holds strategic value in expanding China’s strategic depth of the westward direction and maintaining its development space. Compared with the systematic layout of “trinity” of military bases, military alliances and military facilities constructed by the major Indo – Pacific countries, China needs to adopt a broader perspective of two oceans and two continents, give full play to its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advantages, deepen the 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network with the countries within the region and along the coast,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trategic fulcrums, and constantly enhance the capacity for long – distance operations—all to safeguard its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development space in the Indian Ocean.

Keywords: Indo – Pacific Strategy, Western Indian Ocean, Africa, major power rivalri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uthors: Jiang Lu, Assistant Researcher of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art – time Researcher of the Fud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Shanghai 200336); Shu Zhan, Senior Researcher of 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Director of the Africa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100036).

Tribe Issues in the State – Building of South Sudan

Liu Hui

Abstract: This study provides an in – depth analysis of the tribes’ pivot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outh Sudan's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the inherent tensions. The tribes, as the main social organizations of South Sudan, have a decisive impact on the process of its state building.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South Sudanese tribes include diversity, decentralization, high autonomy, militar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of conflicts. These characteristics pose structural conflicts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tate. The independence and self-organization of tribes limit the state's ability for political integration, the militarization of tribes weakens the state's legitimate monopoly on violence, and tribal identity becomes an obstacle to the national identit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se institutional predica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building and elucidates the political impacts of tribal issues on the state building of South Sudan, including the governance pattern of strong social forces and weak state power, as well as the failure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due to the lack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at the key to South Sudan's state building lies in harmoniz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ibes and the state, and integrating tribes into the modern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Keywords: South Sudanese Tribes, State – building, institutional predicament, ethnic politics

Author: Liu Hui,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 Xi'an Shiyou University (Xi'an 710065).